

「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平妇女』行动研究」报告

网上版

作者：陈顺馨、陈惠芳、赵群、罗燕

编辑：张彩云、陈顺馨

出版：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和平妇女」项目

香港屯门，2014 年 2 月

目 录

1. 前言

1.1 「和平妇女」是谁？

1.2 为何要将和平的讨论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关注或议题上？

1.3 「行动研究」是什么？

2. 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张力

2.1 （云南）优内与猛宋光明村妇女小组：在主流市场经济冲击下寻
找出路

2.1.1 行动计划背景

2.1.2 绿肥种植和有机堆肥实验

2.1.3 有机茶叶销售

2.1.4 生态与发展的张力

2.2〔内蒙〕殷玉珍：种树治沙与发展的张力

2.2.1 行动计划背景

2.2.2 建立生态教育基地

2.2.3 发展的张力

3. 和平行动的性别主体

3.1〔山西〕王树霞和段锁兰：女性作为生态耕作转型的知识主体

3.1.1 行动计划背景

3.1.2 生态种植与健康生活培训工作坊

3.1.3 以沼液代替化肥农药的实验

3.1.4 水果品尝和果园观摩交流活动

3.1.5 女性作为知识主体

3.2〔江西〕王华莲与妇女鼓队：社区音乐的行动主体

3.2.1 行动计划背景

3.2.2 建立妇女鼓队

3.2.3 社区音乐工作坊

3.2.4 社区音乐会

3.2.5 面对水污染问题

3.2.6 妇女作为行动主体

4. 另类生活的可能性

4.1 〔香港〕王爱华、杨宝熙、陆少琼：从食物展开的城市生活思考

4.1.1 行动计划背景

4.1.2 「快乐厨房@社区」行动计划的展开

4.1.3 社区有厨房，厨房有社区

4.2 〔台湾〕徐兰香：从护士到养生到集村的尝试

4.2.1 行动计划的背景

4.2.2 「养生护士俱乐部」背后的理念

4.2.3 「养生护士俱乐部」行动过程：从外出探访到「集村」的尝试

4.2.4 结语：一位地球守护者与母亲的和平愿景

4.3 〔四川〕高清蓉：以建立城乡共同体保护地球

4.3.1 行动计划背景

4.3.2 配送蔬菜和消费者教育

4.3.3 生产者的联系和教育

4.3.4 掌握生态种植技术

4.3.5 建立生态农耕示范园

4.3.6 总结：逆流而上的选择

5. 总结：可持续和平的条件和愿景

5.1 从日常生活做起

5.2 重视妇女的智慧与行动力量

5.3 打破身份、地域界限

5.3.1 研究者与行动者的界限

5.3.2 地域上的界线

5.4 和平的逻辑及价值的传播

报告内容

1. 前言

1.1 「和平妇女」是谁？

2003 年 3 月，一个名为「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在全球展开，目的是在全球提名一千名女性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从而引起世人讨论何谓「和平」，并确认女性对和平的贡献。发起这项活动的欧洲议会和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一文高博士说：「和平不可能是个人可以达到的，因此妇女走在一起，结成网路、团体和联盟。从每天的工作，她们看到，和平并非仅仅是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消灭……而是获得安然的日常生活。」

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是获得自在和安全的日常生活。而且，只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创造各种条件，和平才能持续。在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男性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女性的角色被视为无关宏旨。诺贝尔和平奖从 1901 年设立一百多年至今，只有 13 名女性获颁和平奖，就是一个例子。维尔莫一文高博士认为，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暴力——包括个人和制度层面的暴力——跟战争中出现的暴力息息相关，而女性往往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女性也是日常生活的守护者和和平的缔造者。从守护家人和维护自身权益，到扶助弱小、结连社区和保育生态，女性都是在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也是在消除暴力的根源。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突显了「和平」更广阔的含意，以及女性在创造和平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也有 108 名女性获得提名。她们被统称为「和平妇女」。但无论是 1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还是 108 名来自中、港、台的女性，她们不但代表自己和她们的伙伴的贡献，也代表更多更广的女性群体。这些女性很多处身社会的底层或边缘，但却有坚韧不屈的精神，并且一直为家人、邻舍以至社会追求更美好和更公义的生存环境。因此，「和平妇女」这称谓不限于获提名的一千名女性，而是指所有通

过日常生活实践，缔造和平的女性。

「和平妇女」的实践十分多样化，以中、港、台三地的「和平妇女」为例，有长期致力于维护劳工和弱势社群权益的，有从事生态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扎根乡土为村民谋幸福的，有孜孜不倦以教育下一代为己任的，也有通过文字、影像和音乐关爱众生的。

自 2008 年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十多名妇女和她们的社群参与了一项名为「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的行动研究计划，这项行动研究以香港的岭南大学为基地，由一个来自香港、大陆和台湾的专业研究人员所组成的研究团队负责推动。这群「和平妇女」中，一些来自偏远的农村，一些来自繁华的城市。她们生产环保清洁剂，从事生态 / 有机耕作，制造具传统特色的食物，推动「社区支持农业」，在沙漠植树造林。总之，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守护家人和社区的生计和健康、保育生态和建设本土文化。

参加行动研究计划 「和平妇女」名单一览

和平妇女/团体 所在城市/乡镇

殷玉珍 内蒙乌审旗河南乡毛乌素沙漠

杨海澜 宁夏银川腾格里沙漠

王树霞、段锁兰

栗家庄妇女协会/康达养猪专业合作社 山西汾阳市栗家庄村

王华连

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 江西万载县白水乡永新村

优内

勐宋光明妇女小组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龙镇勐宋村

高清蓉 四川成都市郫县安龙村

陆少琼、王爱华

绿色女流/绿慧公社 香港

杨宝熙

自在生活 香港

徐兰香 台湾台东县东河乡都兰村

邱静慧

美浓爱乡协会 台湾高雄市美浓乡

陈来红、陈秀枝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 台湾

1.2 为何要将和平的讨论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关注或议题上？

这项行动研究计划的目的，是探究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和平妇女」，她们在生态、生计与文化等方面所面对的暴力，以及她们处理 / 回应这些暴力的行动的经验、策略和困难。

日常生活的各式暴力跟战争中出现的暴力息息相关。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对自然资源的需索，固然直接导致一些国家的内战和对平民的侵害，但即使没有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地方，百姓也并未获得「安然的日常生活」。事实上，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却越来越感到危机处处，如环境和食物污染、职业病、工业意外、粮食危机、社会不公、文化单一、传统失落、等等。

过去几十年，因为追随西方的工业发展道路，崇尚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经济逻辑，中、港、台三地农村的人力、产品和自然资源，都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但带来的却是环境和食物的污染，危机四伏的工作环境和粮食价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土地成为投机工具，农田日益荒废，农村逐渐失去自给自足的能力。「经济

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未减少社会不公，相反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严峻，而只讲究物质利益的社会文化则令人际关系更为疏远，文化和精神生活更为贫乏。

如果「和平」是指和谐及安全的生活环境，那么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生态危机、农民和基层市民生计困厄、社区解体、人心浮躁不安等，正显示没有战争不等于「和平」，暴力不限于军事或武力冲突。而且，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暴力，往往就是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因此，要获得持续和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关注人们如何受到这些问题影响，他们怎样面对这些问题，以及他们的行动带来什么改变。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可持续和平」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生态、生计和文化（包括关系、价值和知识）上。这三者息息相关，互为作用。简单来说，可持续的生态是有机的、平衡的和循环的，即顺其自然的；可持续的生计以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平衡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和公平的流通，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源维持生命和生活；可持续的文化则包含对人、土地和传统的爱护和尊重，重新建立被切割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崩溃的价值，促进性别平等，生产（包含积累和流通）横向的、富创意的和解放性的知识等。

一直以来，大多数女性承担着照顾家人饮食起居的责任，在维持家庭生计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不论是生态、生计还是文化上的危机，都对女性构成直接冲击，而女性也以各种方式作出回应和寻出路。这项研究深入探讨了「和平妇女」在改善生态环境时，她们在生计上的考虑以及面对的矛盾。研究也探讨了「和平妇女」处身的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如何影响她们的行动，这些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反过来又如何因为她们的行动而发生变化。

1.3 「行动研究」是什么？

行动研究是一个从经验中学习的过程，是实践、反思及学习三者的辩证互动。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或策略，参与式行动研究不会把研究对象视为被动的，而是积极参与整个研究计划，包括行动的设计、执行、讨论、评估以至发表报告，均与专业研究员一起推进。换句话说，研究与行动分不开，研究者就是行动者，行动者也是研究者，大家相互学习及分工合作本身，也是和平的过程。

……和平需要我们行动起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社会制度及日常

生活的态度和习惯，才能持续。

行动需要我们不断对自己的工作及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并通过学习交流，更新我们的思维、价值观、对事物的认识和工作方式，扩大视野，调整目标，创造新的可能性，才能持续。

研究，就是总结和反思经验，并进行学习交流、更新、调整和创造的行动过程，让我们原来有价值的和平工作能够持续下去。

换句话说，研究就是行动的一部分，行动也是研究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行动者和研究者。在这个研究中，农村的生产者和城市社区的实践者，跟在学术、研究和发展机构工作的，都是研究的主体：前者自己研究自己，后者也不同程度参与其中，扮演协作、辅助、观察和纪录的角色，最后，将大家的行动研究经验进行总结及分析，变成有用的材料，供其他人分享及参考。这便是行动研究的含义。

总的来说，行动是和平和研究的中介。

参与这项行动研究的「和平妇女」，2008年8月在银川举行的第一个工作坊中，各自针对自身面对的问题及需要，制定未来两年的行动计划。2008年9月至2010年12月是行动计划的实践/推动期，在此期间，研究团队成员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和平妇女」协作各类活动和进行纪录与访谈，她们之间也进行了互访交流。2010年12月在香

港举行的第二个工作坊中，各人报告了两年行动计划的进展和结果，进而互相提问、讨论、反思和总结。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对部分行动过程进行影像纪录，剪辑成一套名为《妇女、和平与可持续生活》的纪录片系列，在不同社区放映。可以说，除了各个点采取的不同行动方案，大家共同参与的工作坊讨论、「和平妇女」的互访与交流、录影的制作与放映等，均是这个行动研究采用的方法，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景象、知识和情感，并显示和平行动的力量和行动的性别特点，这都是这次行动研究的成果。

以下将会通过三个重点：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和平行动的性别主体和另类生活的可能性，对七个行动计划进行案例分析，展示各自的行动过程和含义，最后总结可持续和平行动的条件与愿景。

2. 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张力

2.1〔云南〕优内与勐宋光明村妇女小组：在主流市场经济冲击下寻找出路

2.1.1 行动计划背景

勐宋地处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西南角的大勐龙乡，与缅甸相连，是一个哈尼族爱伲人居住的山村。光明村是勐宋的一个自然村，大约 80 户农户，全村的主要生计是种植水稻、蔬菜和茶叶。光明村的妇女小组于 2003 年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协助下成立，CBIK 说服妇女种植蔬菜，组织蔬菜种植小组、茶叶种植小组，并进行小额贷款。优内是光明村的妇女小组组长。2008 年在「和平妇女」行动研究的「银川工作坊」上，她提出的行动计划之一，是为勐宋的有机茶寻找销售网路，促进有机茶叶的销售。

爱伲人传统上是以刀耕火种的轮歇农业为主，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受「以粮为纲」的国家政策影响，当地的森林被开垦为水田和菜地。70 年代后，勐宋作为茶叶种植重要区域，开垦大批新型茶园。2000 年后，茶叶市场的价格逐年攀升，每年在轮歇地和森林中开辟的新茶园快速增长，至 2008 年勐宋的山地九成给开垦种植了茶叶，茶叶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2007 年茶叶经济泡沫爆破，普洱茶的价格从高位陡降，跌至上年价格的十分之一，不少村民因此负上沉重的债务。2008 年行动研究展开时，优内最希望解决的，自然是村民的生计问题，她因此提出为有机茶开拓销售网路，并且希望行动研究团队提供协助。然而，2007 年茶业价格大幅下滑，有机茶的市场很难在短期内开拓，加上勐宋也在研究建立有机茶叶合作社，优内的想法因此未能即时落实。

CBIK 过去曾向优内、妇女小组和村民介绍有机种植，他们对有机耕种有一定的认识，故此当台湾「和平妇女」徐兰香建议村民尝试种植绿肥，改善稻田的肥力从而增加水稻产量，他们也愿意尝试。虽然绿肥种植试验只进行了一年便放弃了，但妇女小组和村民愿意继续探索有机耕种的技术，优内便在行动研究团队的协助下，组织了一次有机堆肥培训活动，并推动妇女展开有机堆肥的实验。

除了探索有机耕种的技术外，优内在家里设立了图书室，希望加强妇女间的学习和交流。为了解决村民的生计，她又探索向顾客直接销售有机蔬菜的可能。她们还组织了一次「社区漫步」，鼓励村民关注村中的卫生和环境。

优内和妇女小组三年的行动计划主要围绕生计、生态和环境的议题，下面集中讨论她们种植绿肥和进行有机堆肥的实验，以及为光明村的有机茶叶开拓市场所面对的困难。

2.1.2 绿肥种植和有机堆肥实验

2008 年 10 月，台湾「和平妇女」徐兰香到勐宋看望优内和妇女小组。兰香有丰富的生态种植经验，她发现勐宋的稻田很贫瘠，所以产量很低。她建议村民种植绿肥，增加土地肥力。优内征求村民们的意见，有 60 多户村民愿意尝试种植绿肥。行动研究团队于是购买了 200 斤绿肥种子，发放给村民。他们将部份种子种到茶地里，部份则种在菜田和稻田里，前者未能成活，后者的长势则很不错。试验结果显示绿肥的确能改善土壤，然而村民没有继续种植绿肥，主要原因是绿肥长得高，在犁田的过程中不断被绞进犁地的机器中。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就必须将长高的绿肥先割倒、再犁，但是这就增加了备耕的工序和劳力的投入。负责犁地的主要是男性，他们觉得种植绿肥改良土壤的方法太麻烦，不愿意再尝试，而妇女们觉得男性不同意就很难再做。结果第二年村民就没有再种植绿肥了。

在村民放弃绿肥种植后，优内在行动研究团队协助下，策划了一次生态农业培训。2009年夏天，大约30名妇女和村民参加了培训活动。培训员向妇女们介绍了健康土壤与环境、有机堆肥和培养微生物的方法，并和妇女小组们一起动手制作堆肥。培训活动完结后，有18位村民报名参加堆肥实验。她们希望将堆肥用于种植蔬菜、核桃，甚至作为茶叶的追肥。

妇女们掌握了基本的堆肥技术并愿意尝试，但堆肥实验的具体开展日期一拖再拖，从2009年的冬天拖到次年春天，很快要到第二年备耕水稻的季节，但参加实验的村民家开始做堆肥的很少。总结原因有两方面。第一，这几年因为茶叶价格大跌，村民生计不稳，妇女农闲时都外出或在附近打工赚钱，没有时间做堆肥。第二，堆肥需要密集的劳动力，做堆肥用的大量草和青绿植物要用拖拉机运送。如果家里没有人帮忙，妇女要独自完成，十分困难。

其实，在计划堆肥实验时，已考虑到劳动力的问题，因此参与的妇女给分成小组，合作堆肥。有一些小组进行了堆肥，但由于各组使用的材料不同，做的时间和数量也不同，发酵的程度也不同。优内于是安排了交流会，让妇女和村民交换经验。

绿肥种植和堆肥的实验，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外，主要障碍其实是生计的问题，其次则是性别的因素。村民放弃种植绿肥，主要是因为必须增加劳力的投入，而劳力的投入不会即时带来收入。同样，堆肥也需要较密集的劳力，而参加的妇女，很多宁可在农闲时打工挣钱，堆肥的实验便一再拖延。这些行动计划展开时，正是茶叶经济泡沫爆破后。作为村民主要经济来源的茶叶价钱忽然大跌，令很多村民的生计出现困难，打工赚钱是解决生计问题最便捷的方法，生态种植便只能让路了。

至于性别的因素，如前所述，不论是绿肥种植还是堆肥，都需要男性帮忙犁地或用拖拉机将收集所得的大量堆肥材料运回村里。要是男性不同意或者不帮忙，妇女们就很难坚持下去。

2.1.3 有机茶叶销售

光明村妇女小组组长优内一直渴望拓展有机茶叶的市场，无奈茶叶市场在 2007 年严重衰退。前面曾提到，在 CBIK 的帮助下，勐宋组织了有机茶叶生产合作社，勐宋古茶也通过了认证并注册了商标。但是，

由于合作社成立不久，为了保证销售，只有少数人能够入股成为社员，而且进入主流市场过程中，合作社面对重重困难，无法收购所有社员的有机古树茶叶。

在主流市场中，有机茶叶每年都需要支付大笔认证所需的费用，只有大企业才能负担，普通农民根本不可能取得认证。事实上，茶叶市场已经被大企业垄断，而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很少向一般茶农收购茶叶。此外，在主流市场中，勐宋茶叶由于口味浓郁苦涩，被茶商定位为配茶，用来与其他有名茶山的茶叶混合加工，提高茶叶甘苦的口味。这样的定位令勐宋茶叶销售价格很难提高。另外，茶叶市场混乱，造成茶质良莠不齐，人们对所谓的生态茶、有机茶半信半疑，也影响了有机茶叶的销售。

行动研究团队曾协助优内通过 NGO 的网路，了解是否可以以「公平贸易」、「社区支持农业」的形式来为光明村有机茶开拓另类市场，但一些从事「社区支持农业」的朋友回覆，按现有的茶叶品质、数量和预期价格，勐宋茶叶很难找到高价位。然而，光明村村民对开拓茶叶市场仍存有期望，因为茶叶始终是村民主要经济来源。光明村大部分村民 2009 年的一年总收入在一万元左右，其中茶叶带来的收入占近半。

2011 年 3 月，优内跟行动研究团队一起到了昆明，参观了销售生态农副产品的社会企业「绿耕昆明店」和「帮帮健康生活馆」，又跟负责人谈了销售勐宋生态茶的可能。她又结识了四川成都「紫气东来会所」的负责人傅雪梅，并向她详细介绍了勐宋茶叶生产、加工、销售的情况。傅雪梅随即到勐宋考察，购买了 45 公斤勐宋生态茶。4 月，绿耕负责人邹胡东和黄亚军也到了勐宋。之后他们购买了 100 公斤的生态茶，在「绿耕广州店」销售。5 月，「帮帮健康生活馆」也决定试售勐宋生态茶。相对于勐宋大量的茶叶产量来讲，这样的销售量不算多，但对优内以及妇女小组无疑是一个鼓励。

2.1.4 生态与发展的张力

勐宋爱伾人传统的轮歇农业是靠土地的轮作和休耕来解决土地肥力的问题，火烧青绿植物是他们追肥的主要方法。70 年代在政府的宣导下，爱伾人开始使用农药化肥。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单一化的种植业也在迅速地消灭当地多样化的农作物品种。过去在勐宋仅水稻和旱稻的品种就有 30 多种，而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的不到三种。原来广泛种植的各种豆类、薯类、芋头和各种蔬菜，现在也仅存

少量的豆类。

单一化的种植业使得农民难以自给自足，生活和生产都日益依赖市场和现金收入。与此同时，爱伾人世代生存所依赖的乡土知识，包括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利用，以及与刀耕火种农耕相关的系统知识渐渐地打碎，令他们越来越依靠外来资源和知识。

与此同时，从 80 年代起，「经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东部与西部、坝区与山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张力下，生活在西部边境山区的勐宋爱伾族处于边缘位置。在这种张力的牵引下，「经济发展」对当地政府和村民更感迫切，更无暇顾及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

在光明村，虽然村民知道化肥和农药对健康和生态有不好的影响，但大部分村民仍继续使用化肥和农药，主要原因是生计的考虑。以除草剂为例，随着茶叶种植面积成倍增长，茶叶地管理需要投入的劳动量急剧增加，使用除草剂给茶叶地除草是最省力的办法。有机耕种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而且不能带来即时的经济收益，加上村民的生计正受到茶叶市场变化威胁，除了盼望茶叶市场复苏，村民只能抓

住眼前最快赚钱的方法——打工——来维持日常的生计，有机耕种的尝试便只能搁下了。

「我们村里每次都议论这个生态方面的，不管是做什么产业，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要做生态的，但是在价格上也不会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做什么好像没有感兴趣一样。」优内这番说话，正好反映了光明村妇女和村民在生计压力和「经济发展」的主流意识型态下的感受。

2.2〔内蒙〕殷玉珍：种树治沙与发展的张力

2.2.1 行动计划背景

在早期的沙漠科学研究里，作为「荒漠」的一种，沙漠是一个统称，指的是「干旱地区地表为大片沙丘覆盖的沙质荒漠，也包含了沙漠化土地和半干旱地区的沙地」，但后期的研究倾向把沙地从沙漠中区分开来，将之定义为「把分布于草原和草原地带以固定和半固定沙丘为主的沙丘地区称为沙地」。这区分清楚告诉我们，「和平妇女」殷玉珍

的家——毛乌素沙地——原本不是沙漠而是草原。毛乌素是经过一个荒漠化的过程，才变成今天的沙地。

毛乌素位于内蒙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和陕北黄土高原以北的乌审洼地。鄂尔多斯高原是中华文明「河套人文化」的发源地，原本的生态和文化环境具丰富多元的特色。在植被地带，它处于典型草原向东南的森林带和向西北的荒漠化草原带的过渡；在人工生态方面，属于农、牧、工矿的交错区；社会文化系统方面，是一蒙汉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区，历史上就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复合交错区。然而，由于过渡放牧、樵采和开垦，植被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之后，该区政治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人口也急速增长，对土地造成更大的压力。

解放后，政府基于生产的需要，多次大规模开垦内蒙古的草原，90 年代更引进外来资本，不仅大规模开发地面的草地，还大规模开发地下水资源和矿藏。自然资源产业的开发，使得蒙陕边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但同时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相关的建设和城镇化不断吞噬耕地和草地，并破坏无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使得原来脆弱的生态系统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从 70 年代起，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沙漠化的问题，并且以种树作为主要的治沙方法。殷玉珍是因为在治理沙漠方面作出惊人贡献而赢得「全国劳模」、「十大女杰」、「三八红旗手」、「防沙治沙标兵」、「双学双比标兵」等荣誉，同时给提名进入「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地区的 108 人名单。然而，玉珍治沙，最初只是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1985 年，19 岁的玉珍在父亲安排下，嫁给独个儿在毛乌素沙地生活的白万祥。初到毛乌素时，玉珍只见滚滚黄沙，一个腰高的小窝棚就是她和丈夫的家。玉珍哭了七日七夜，之后决意要活下去。凭着二人年青力壮，他们不但建了土坯房，还开始种粮食。为了挡住风沙，他们在家的四周种树，在十多年间种了数以十万计的树。1999 年外界知道他们的事迹时，他们已为毛乌素沙地造出了全绿化林地 27300

畝，林地面积 2007 年已达到 5 万多畝。

树木成林后，玉珍家四周的环境得到改善，风沙少了，降雨/雪量比 30 公里以外的乡镇高，植被得到某程度的恢复，耕作的产出也得以增加。成为风障的林子也减低了风沙对树苗的影响，存活率得到提高，

树成长后能提供枝叶喂养牲畜，不用倚赖放牧，牲畜的粪便又为土地提供肥料。这样，由种树所引发的循环式自然农畜生活方式，以另一种方式发挥治沙的功效。

玉珍的努力，不但为她带来国内和国外的荣誉，还为她带来外部资源，包括来自政府的和私人企业的财政支持，而玉珍也想利用她的土地和知识，干一番事业。「和平妇女」行动计划开始时，当地政府已为她建了两层的水泥房子。一个私人团体捐钱为她建了一个蒙古包，用来接待客人。2004年，私人企业给玉珍铺设了一条正式的道路，路口竖了一个写着「玉珍农林基地」的牌门。

2.2.2 建立生态教育基地

自从被确认为种树劳模和环保先锋，有机会参与不同地方的环保会议后，玉珍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仅在中国，全世界亦然。在国内，以种树作为治沙的方法是主流，得到政府的支援，而玉珍也看到内蒙的绿化过程，认为有责任继续种下去，并希望将自己20多年种树治沙的经验，传授给别人。因此，她决意建立一个生态教育基地。

要建设一个生态教育基地，软体和硬体要配合好。在软体方面，除了需要寻找合适的团队成员之外，一个教育基地还需要确定面向的是什么人或团体，用什么方式进行教育的工作等。玉珍跟环保团体和教育机构没有很多联系，因此这方面完全没有头绪，唯一她可以使劲的地方是硬体的建设。在外部的支持下，这方面很快便准备就绪，只是具体的设计跟生态教育基地的想法可能有些冲突。

起初，鄂尔多斯市一家规划设计公司给玉珍设计了一个生态园建设方案，但规划的定位不是教育，而是将玉珍的农林基地发展为一个旅游和接待的场地，宣传鄂尔多斯的蒙元时期宫廷部落文化，涉及的投资高达 800~900 万。玉珍对这个设计有些不满，但玉珍心目中的生态教育基地的规模也不少，她认为起码要能接待 120 人。

行动研究团队一方面尝试协助玉珍联系环保团体和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也就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包括教育基地的规模、对象、资金来源、基地对四周环境的影响和教育基地的可持续性等。就一个教育型的基地的可持续性来说，行动计划团队认为，如果这个基地主要提供体验沙地、学习治沙、交流心得和反思固有生活习惯和价值的机会，而不是高度污染城市以外的又一个开会或度假的「世外桃源」，

到来的人要做什么，怎么做，必须是由玉珍和她的理想团队成员决定的，或者是跟他们商量的，而不是用主流消费者的心态来随意做。因此，一个生态教育基地应该主要面向环保团体、大学生和热爱自然的个人，而玉珍和她的团队可以是主要的教育活动协作者，但这需要途径和时间去联系和磨合。

行动研究团队曾经跟北京的一些环保团体和大学联系，讲述玉珍的情况与需要，但由于时间和人力都有限，当时未能为玉珍成功搭建需要的关系，让她看到其他可能性。拥有类似工作模式和经验的台湾「和平妇女」徐兰香，2009 年探访玉珍，与她交流发展生态教育基地的想法，虽然能引起玉珍的共鸣，但始终不是她要的方案。

2010 年玉珍出席行动计划的「香港工作坊」时，生态园的建设计划已获鄂尔多斯市长批准。玉珍当时说，生态园将成为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面向全国大学生。而据《中国日报》2012 年的报导，占地 2000 亩的「玉珍沙漠生态示范园」已经建成。在政府的帮助下，生态示范园不但有专门的电力供应，还开垦了水浇地 500 多亩，建了八公里水泥路。生态示范园不但是治沙教育的一个基地，而且还提供休闲娱乐和运动健身的消费活动。而乌审旗市也会在生态园内建设面积

达 5300 平米的「生态文明建设教育基地」。

2.2.3 发展的张力

对鄂尔多斯市、内蒙古省到中央政府而言，无论是要推行治沙政策，还是开发大西北，玉珍的事迹正好为「大发展」提供感人的励志故事，一方面展示治沙的效果，另一方面显示主流规模化和快速发展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玉珍被发现后，政府和私人企业均积极介入，除了给玉珍各种荣誉外，也向她作出财政支持，让生态园实行规模化发展模式，并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作为生态园的规划方向。换句话说，玉珍对生态教育基地的构思，由于受到政府和主流发展观念的影响，不论是在规模还是功能上，都似乎跟她原来的想法背道而驰，而这反过来很可能会威胁生态园以至沙地的可持续性。

2010 年玉珍和儿子国林出席行动研究计划的「香港工作坊」时，国林表示生态园水位正在下降。地下水急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跟导致荒漠化的「五滥」（滥垦、滥牧、滥伐、滥采和滥用水资源）有关。研究沙漠化的一些专家认为，盲目开发生态环境脆弱的草原和沙地以及过度利用地下水资源，会造成地下水下降甚至干枯。然而，在「有

利于」沙区经济发展和群众收入的前提下，即使国家的治沙专家，也建议「适度发展沙产业」，例如旅游资源、风能资源、矿产资源等。随着这些资源的「开发」而来的，不仅是土地的开垦，还有工业和商业的建设，以及人口增加和城市化带来的对水资源的压力，可以说与治沙目标相矛盾。

在荒漠化严重的西北地方，水资源「滥用」无可置疑跟「开发大西北」等主流发展有关。玉珍家附近就不断有开矿的钻探工程在进行，而整个地区都在大量开采天然气和其他矿产，玉珍的林子为那里带来的额外雨量，远远追不上「发展」所耗用的地下水。

自从种树治沙在政府政策推动下成为「热潮」，玉珍一家也获得额外的收入来源。除了来自政府的种树补贴外，玉珍还开发了培育樟子松树苗的基地，自己不用买树苗之余，还可以将树苗卖给别人。另外，由于来买杨树的木材的人多了，他们也开始卖木材。可以看到，种树在玉珍他们后来的生活中，已经不仅提供生活需要的原材料，而且还为她一家赚取现金收入。除了卖树苗和木材外，玉珍还种植和销售「绿色产品」，如西瓜、土豆、小米、黄米、绿豆等，另外还养牛羊。总之，不论是生产活动还是接待数以百计来参观吃饭的人，都要用上大

量的水，而且用量必定不断增加，对当地的水资源自然也构成压力。

虽然如此，玉珍的「沙产业」，相比庞大的国家或大资本的发展项目，一家人、一个规模不算很大的农耕基地和一个大部分成材的林子，就算影响地下水，都是有限的，速度也不会很快。但是，由于政府和私人企业的介入，她后来建成的生态园不但建设规模大，运作模式也受着主流的发展模式影响，地下水以至其他自然资源必然受到更大的压力。问题是，玉珍是否意识到，经济优先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大自然应该为人类「所用」的功能性思维，正是现时中国土地荒漠化形势呈现出「治理与破坏」相持，甚至「治理赶不上退化」情况的根本原因。

3. 和平行动的性别主体

3.1 （山西）王树霞和段锁兰：女性作为生态耕作转型的知识主体

3.1.1 行动计划背景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 2011 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大陆每年施用

的农药超过 130 万吨，化肥则超过 4000 万吨，以播种面积计，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准的两倍多和三倍。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中国大陆受污染的土地超过 2187 万公顷，占耕地面积 16%。

在中国大陆，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农药化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入农村，由集体供销社供应，各村并设有技术员，指导农民定时施肥喷药。但是国产化肥农药产量不多，不是每个生产队或每个村都获得分配。但是，从 80 年代初开始，农民已经可以轻易在市场上买到化肥农药。

位于山西省汾阳市附近的栗家庄村全村有 580 户村民，大都以务农为生。1995 年前，栗家庄村以种植大麦、高粱、黄豆、玉米等粮食为主，但由于水资源日益短缺，加上果树经济效益较高，村民逐渐改种梨、苹果、桃、核桃和枣等果树。随着果树面积不断扩大，栗家庄变成了一个规模化的水果种植区。栗家庄上到村委，下到村民，都将「工业富村、林果兴村」奉为圭臬，但以追求高产为目标的规模化种植，产量主要依赖大量使用农药化肥。

被评选入中国「和平妇女」108 人名单中的王树霞，一直在栗家庄村带头搞文化和生产建设，包括组织栗家庄妇女协会和养猪合作社。另

一位女农段锁兰是王树霞的工作伙伴，并与王树霞一起在村里推动「和平妇女」的行动计画。

2008 年 8 月，锁兰出席了行动研究计划的「银川工作坊」，有机会反思自己家乡的农业和农民面对的问题。锁兰的丈夫在村里为其他村民打农药，由于常常接触农药，健康转差。想到丈夫和全村人的健康，锁兰决心行动起来。她制定的行动计划，目标是全村停止打农药，行动方案首先是通过宣传，让村民认识农药对健康的危害，然后找寻农药的替代物，推动全村向生态种植转型。

锁兰对行动计划充满信心，因为栗家庄拥有能替代农药的现成资源——沼液。沼液由人畜粪便和植物等有机物经厌气发酵形成，含有的激素和抗生素等能帮助作物抵抗虫害。栗家庄第一个沼池是树霞 2004 年建的。她当年参加了乡建学院的培训后，想在全村推广沼池。2006 年，省政府、村委和村民共同出资，在村里建了 103 个沼池。

3.1.2 生态种植与健康生活培训工作坊

要让村民放弃使用化肥农药，必须先让村民认识到化肥农药的害处，

树霞和锁兰为此在 2008 年冬季举办了一个「生态种植与健康生活培训工作坊」。

为了开好这次培训会，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培训回来的我们，更是信心十足，姐妹们都积极地参与了进来。侯玉香、李俊梅每天组织妇女们跳舞排练，更加认真；陈丽清帮我们找场地、找投影器；我和锁兰、宝麟更是上网查找有关生态环保的知识，进城列印宣传画报；村委朱继尧支书也大力支持我们，给我们提供了中心广场的厚玻璃宣传栏，列印了会标等。大家又分头到户宣传、确定能坚持听三天课的人员。

——王树霞，2009，《我们不能少看自己》，王树霞的博客，10 月 2

日

树霞和锁兰邀请行动研究团队协作这次培训，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三名成员则提供技术支援，台湾的「和平妇女」徐兰香也特地来到栗家庄，跟村民分享她的生态种植经验。培训工作坊上，大家首先讨论的是使用化肥农药后农地的变化，如土壤板结和地下水受污染，以及村民的健康如何受到影响等。之后大家谈到生态农业的概念、

以沼液代替农药的方法和养草的好处等。工作坊又示范如何制造果树营养液。三天的工作坊，每天都有 50 多位村民出席。

树霞和锁兰事后走访参加者，他们大都认同必须停用农药，但同时担心不用农药，一旦发生虫害，收入会受到影响。

3.1.3 以沼液代替化肥农药的实验

尽管村民对以沼液替代农药信心不足，但有十户村民同意参加 2009 年的生态耕种转型试验。为了减轻村民的忧虑，锁兰她们决定先进行小范围试验，参加的农户只拿出一部分果树做试验，并且只在不那么关键的时间喷沼液。她们还给每户做了「有机果树示范户」的牌子，让其他村民看见试验的进行。

与此同时，锁兰在徐兰香的「养草护土」理念启发下，率先在自家果园养草。过去，村民认为草会跟果树争肥，影响果树产量，所以总是把草锄得干干净净。徐兰香探访栗家庄时，注意到这情况，指出养草有助保护水土。锁兰于是在草结籽前将草割下来铺在地上，发现铺有草的地湿湿的，有助保水。另外，草经过一段时间堆沤，变成了肥又

回到了地里。

一年后，锁兰总结试验，认为使用沼液和养草果树长得较健康，所以建议增加沼液的使用量和喷洒次数，并进行养草。她又走访了十多户没有参与试验的村民，鼓励他们加入试验，试验户因而增加到 20 户。大家赞成锁兰的建议，锁兰自己家更拨出三亩的果园中做全面使用沼液的试验，并系统地记录了果园出现的变化

但是第二年的实验计划遇到一些困难，包括沼液供应不足和有些试验户的果园出现较为严重的虫害，因此沼液的使用量和喷洒次数没有增加，有些反而减少了。锁兰家的试验果园也遭遇了虫害，但她和丈夫坚持不用农药，结果减产约六成。不过，锁兰他们没有气馁，因为早有心理准备要为试验付出一些代价，而且她家有其他收成，足以维持生计。

养草的试验成绩较为理想。农户认为养草的确可以保水，而且草的品种变多，果树变壮，益虫多了，害虫少了。总的来说，两年行动的初步结果，是村民改变了对草的看法，确认草不仅没有影响果树结果，还对果园整体产生良好作用。至于以沼液和其他营养液完全替代农

药，因为生计的考虑，村民仍有保留。

3.1.4 水果品尝和果园观摩交流活动

两年的试验后，树霞与锁兰认为应让参加试验的农户跟其他村民直接交流，一起到地里比较果树和土壤的变化。2010年10月8日，村里举行了一个水果品尝和果园观摩交流活动，有30几位村民出席，另外还有陕西果农代表和汾阳市的几位消费者。试验户拿出自家的梨和苹果来给大家吃，让大家比较水果的品质。这是栗家庄开始种水果以来，农户第一次互相品尝种出来的水果。参观结束后，大伙儿回到树霞的院子，一起讨论生态耕种的「代价」、政府的角色和消费者教育等问题。

2011年初春，锁兰开始在果园里试验新的生态种植技术——性诱剂，用物理的方法来防治虫害。她还在果树下移栽除虫菊、大蒜、绿肥等植物，增加果园的生物多样性。

3.1.5 女性作为知识主体

王树霞和段锁兰都是《农家女》杂志社的通讯员，一向在村里积极向妇女推广健康及法律知识。2008年，她们争取到《农家女》杂志社支持，在树霞家里的院子建立了农家女书社，推动妇女一起学习。由此可见，树霞和锁兰二人不但自身爱学习，而且乐于向村民（尤其是女性）推广新知识。因此，当她们了解到化肥农药的危害时，自然也竭尽所能地推动村民向生态耕种转型。

栗家庄村的果树技术员任永忠（男性）开始时对生态种植并不看好。由于栗家庄村村民的果园规模不大而且很分散，他认为要组织村民做试验并达至生态转型很困难。他的看法并未打击树霞和锁兰二人的决心。参考了任永忠的意见，锁兰她们选了果园相对靠近、家里已经有沼池或参加了合作社的农户，游说他们参加实验。锁兰自己也参加了实验，既是为了示范，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经验，结果原来以为是天方夜谭的集体行动得到实现，并且改变了技术员的看法。后来，任永忠不仅参与果子品尝会，还跟锁兰她们合作办培训，把养草、防虫、处理烂果、增加土壤的肥力等他懂得的生态农耕技术，传授给村民。

第一年试验后，锁兰对推广生态种植信心十足。她本想在扩大实验前再做一次培训，让更多村民加入。然而，她在走访中发现村民很想了

解她的试验结果。这让她意识到「钻到地里去做」、用「行动」来说服别人比搞培训请专家更有效，于是放弃了办第二次培训的想法。

在第二年的实验中，除了邀请更多村民参加实验外，锁兰更做先锋性的尝试，在试验的三亩果园里全部和全时间用沼液，不用农药。虽然坚持继续用沼液导致了经济损失，但锁兰没有失去信心，相反她认为

从中获得的经验，可以成为未来实践的基础。

除了通过实践掌握知识外，树霞和锁兰也很重视村民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学习。她们每年把参与试验的村民约到家里，分享收成的情况和对试验的发现，又交换解决难题的意见。锁兰说，试验开始后，每逢下雨天，不少试验户都到她家里坐坐聊聊，在电脑上查查资料。她自己一有空，就串门，在闲聊中传递自己的经验和见闻。女性通过观察和交流掌握知识，就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生。

行动研究结束后，锁兰和树霞继续社区的宣传工作。无论是闲聊时还是筹备文化演出，生态试验和健康生活都是主题之一。锁兰还向村民讲述其他「和平妇女」如何推动生态农耕，让大家知道不光栗家庄在试验生态耕种。她又结合近两年栗家庄气候异常的情况，给村里妇女

讲解全球环境恶化的严重性以及环保事业的重要。锁兰就像信使，把宏观的和微观的环境问题都分析给妇女听。树霞也把试验和参与行动研究的外访经验编成小品，在春节联欢会和三八节演出，扩大宣传农药化肥的危害以及栗家庄的生态试验。

锁兰和树霞推动生态农耕试验的重要效果之一，便是与当地村民一起，在再生产这些知识的过程中，重拾农民和女性的主体意识和位置。研究开始时，她们十分重视外部「专家」和男性的知识，但她们相信，农民拥有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知识，是农业的实践者，可以通过观察、记录、讨论、反思与总结等方法去解决问题。两年的行动计划令她们对男性和专家的态度，由仰视变为平视，也令她们更重视通过自身的实践累积知识。

3.2〔江西〕王华莲与妇女鼓队：社区音乐的行动主体

3.2.1 行动计划背景

中国从 1978 年起启动的市场经济改革和高速城市化发展，给「和平

妇女」王华连遍远的家乡——江西万载县白水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像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这个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的客家山村，渐渐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小孩，农田丢荒，自然环境资源遭破坏，农耕乡村生活文化消失。

香港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The China Social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简称 CSD) 于 1994 年到白水开展妇女项目。CSD 希望通过妇女集体合作，回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对农村资源和生态的榨取。他们协助当地妇女组成互助储金会（以下简称「储金会」），主要活动是种植和销售有机百合粉。

储金会由白水永新村路下和湾里两个村民小组的妇女组成。当年，每人只要交一块钱就可以加入成为会员，参与劳动和其他会务，也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从储金会成立到 2008 年间，华连跟主席许国兰两人，一直出任委员和主席的职位。除了生产有机百合粉外，储金会还组织妇女健康检查和教育活动，利用滚动基金建会所，开办学前班和妇女文化扫盲班，推行改善儿童健康的早餐资助计划，承包山坡种植经济果林，购置碾米机、粉碎机和打浆机等。

「和平妇女」行动研究团队成员赵群 2008 年 6 月到白水探访储金会，观察到储金会内部「有一定的危机」。同年 8 月，华连在行动研究计划的「银川工作坊」报告储金会的工作时，表现出很大的无力感。据研究团队了解，在销售百合粉的利润该如何分配以及分工的问题上，储金会成员有不同意见，而且失去了互信。

自 1994 年被选为储金会委员后，华连一直没有离开过储金会，也没有像其他年轻妇女般，跑到外省打工。她形容参加储金会是她人生的转捩点。储金会不单成为一个妇女合作的集体平台，也让华连跑出路下湾里，接触到「公平贸易」、「生态农耕」以及城乡关系等议题。2005 年华连被提名为千名「和平妇女」之一，并应邀参加两年的行动研究计划。但是，在华连的行动计划中，没有再提储金会的有机百合。她提出的行动计划是发展村里的水资源和建立妇女腰鼓队。

3.2.2 建立妇女鼓队

为什么会有建立腰鼓队这个想法呢？华连说看到别的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活动，觉得对社区的气氛很好，而储金会什么文化形式都没有，就想有一种文化活动。另一位妇女晁南说，几个年轻人去县城看到军

鼓队表演，感到表演得又好，还可以赚钱。如果储金会的妇女也有一个军鼓队，可以增加活动项目，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赚点钱。无论腰鼓队这想法是怎样出来的，反正储金会的妇女，尤其是年轻的一群，都想试试。办腰鼓队免不了要用钱，储金会虽然有基金，但主席许国兰反对动用基金。根据华连的理解，主席觉得这是年轻人的玩意，老人不会跳，所以反对。

储金会的基金不能动，外来支援也不足以支付所需开支，但华连没有气馁，她让储金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自愿凑钱买鼓。华连说：「当时来开会的也就十几个人，大家讨论出委员和小组长每人出 300 元，其他成员每人出 200 元。这样临时凑了 3000 多元。」去买鼓时，卖鼓的人说腰鼓不流行了，劝她们改买军鼓。考虑到军鼓队可以有较多人参与，也不想搞已被淘汰的鼓乐，她们就决定买军鼓。

2009 年初，妇女们开始在储金会的房子学打鼓。她们白天做农活，晚上就到储金会练习打鼓，虽然很累，却充满快乐的笑声。她们将鼓队名为「永新和平鼓乐队」，并选出王华连为队长，除了学打鼓，还学跳舞。妇女们没有请老师，自学光碟和自己就是老师，华连很多时起着带头作用。她说：「每次都要我先学，要我先看。我每天一个人

认真的看，学会了再教她们。」

在学打鼓的过程中，鼓队成员间也经过一些磨合。刚开始，有些人不能接受别人说她不会打鼓，队员之间有些小矛盾。但是在华连的劝导下，大家为了整个集体的荣誉，小矛盾也没有了。练习累了，她们就休息一会儿，围在一起聊天，把白天的劳累抛到九霄云外。妇女们的学习能力很强，进步很快，从学谱、练习打法、配合脚步，到队形排列，在组成鼓队三个月后，她们已经在万载县第二届百合花节上作第一次公开演出。

3.2.3 社区音乐工作坊

2010年初，行动研究团队邀请了香港「噪音合作社」的 Billy、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李昕等，组成「江西社区音乐工作团队」，到白水跟妇女鼓队作音乐上的交流，并举行了两次社区音乐工作坊。社区音乐团队的出现，让妇女们的想像再次起飞，不但学跳舞，还学创作，并且重新探索当地的音乐传统。在唱弹跳（创）作的同时，团队尝试在内容上导引工作坊的方向，改写改编传统山歌，为传统节拍配上对大地和环境的关怀：

大地是我的母亲
躺她怀中得温饱
垃圾农药伤害她
大家来想该咋办唉~~~

社区音乐团队又把《江西是个好地方》这地方民歌配上新词，改名为《湾里路下是个好地方》。这首旧曲新词一唱，马上有人提议来一支队歌。顺着妇女的诉求，妇女们练习敲击节奏、为山歌填上新词、跳舞、声音训练并共同创作了《大地之歌》：

大地长出绿油油的庄稼，
母亲哺育了我们成长。
请原谅我对你无心的伤害，
谢谢你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

妇女喜欢边跳边唱的感觉，喜欢自己编写歌词，希望能够自我伴奏，还有演出小品。有人说：「像山上砍这么多树，会影响我们喝的水。如果编成小品表演就好了，我们就怕自己搞出来不好看。还有垃圾到处是，河里面红的、绿的、黑的、什么都有。」

3.2.4 社区音乐会

李昕和 Billy 根据他们过去在深圳和北京搞工人文艺的经验,建议搞一个音乐会,让社区里不同的人互相看见,感受音乐中的感情和资讯。第二次社区音乐工作坊结束时,社区音乐团队提出,趁当地每年举行的百合节搞一场音乐会,由妇女鼓队负责联络和组织。除妇女外,也邀请老人协会、小学生和传统音乐人参与。

2010 年 5 月 22 日,《白水百合情》文艺演出在白水中学举行,妇女们除了军鼓、舞蹈、歌唱以外,还自编了小品《村里有了垃圾池》。老人协会则不单组成腰鼓队,还旧曲新编歌词:《赞百合之乡》和《送春调》。小学同学们一直排练自己填词的《我的家乡》,以竖笛伴奏。2009 年 5 月妇女鼓队刚成立不久,经打鼓老师引介,鼓队在白水的百合节作了第一次演出,获得非常好的评价。对鼓队来说,演出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光是 2009 下半年,鼓队就有不下十次红白二事或是庆祝新楼落成等演出。但是,这次音乐会令鼓队妇女们的情绪更高涨。妇女们不但因为自己的演出而感到快乐,合作筹办音乐会的过程也让她们之间变得更有默契。而且,村子里久违的集体生活,因为舞台而再次出现,不同的群体也因为这次演出而互相欣赏。

音乐会后，社区音乐团队跟鼓队妇女回顾一起走来的经验，实际的困难和盼望。之后，妇女们做了个一年工作计划，包括继续学跳舞、军鼓、乐器、乐谱、唱歌、写小品，还要继续演出，要写小品，等等。

3.2.5 面对水污染问题

2009 年妇女鼓队成立后，行动研究团队曾跟妇女们谈到鼓队的将来，妇女们提出年轻人外出打工、水资源污染和垃圾处理等问题，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水污染。华连说，村里一直是喝老储水井中那些山水。2007 年冬天「新农村建设项目」为村里修建新井，之后饮用水就变得混浊。妇女们建议覆盖输水管道，行动研究团队则提出保护水源森林和试验生态农耕（包括使用家肥土农药、稻田养鱼等）和垃圾分类，但妇女们的反应不大，华连则认为这些想法「不大可行」。

常规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华连很了解，她自己的菜园固然没有用农药化肥，家里的稻田即便已经让给别人耕作，也反对他们使用农药，就连她本来在街上经营的饲料店，也因为不想卖化肥农药早已结束了。但是，村里的稻田和百合田，大部份仍然使用农药化肥。村民担心，一旦不用农药化肥，产量会受影响。而且当地的田多在山上，挑

农家肥需要很多劳动力，用化肥就轻松多了。也有人认为，如果只有几户人实行生态耕种，事情很难成功，因为虫都会跑到没有用农药的田里去。虽然如此，鼓队还是将化肥农药对生态和健康的危害，编进小品里去，让村民认识这问题。

然而，本来一直说很困难，似乎无望的事情，有人愿意尝试了。2010年音乐会后，陆陆续续有七位鼓队成员开始不再在稻田中放化肥农药。村民又邀请了江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老师去给他们讲解生态种植的基本知识。在没有什么外来资源的投入下，村民种了一茬有机水稻。

2011年5月，五位村民到贵州学习生态农耕，回家时背包塞满贵州百宜瓦窑村的老品种红米、糯米、玉米、豆子，还有可防虫害的乌头苦参。回到白水，他们在村里搞了一个放映和学习交流会，还煮了一大锅红米饭。村民在品尝贵州老品种红米饭之余，争着检视米呀豆呀苦参呀，还争着发问和表达意见。之后，一些妇女开始应用学习到的田边堆肥和用当地的植物做土农药，发掘出白水被淡忘了的土方法。其中一名妇女观华说：「我不管人家怎样说，反正我自己先做试验。

做得好了，他们自然就知道了。」

鼓队方面，虽然没有再办音乐会，但她们创作了一个关于化肥农药的新小品。鼓队成员计划先自己做生态农业试验，然后用小品宣传。鼓队还应邀参加了一个文艺活动，演出了关于农药化肥的改编山歌，华连说观众反应不错呢。

3.2.6 妇女作为行动主体

严格来说，行动研究应是妇女和研究团队结成合作伙伴后，一起行动和思考经验，在过程中凝聚知识和智慧，并最终带来价值观和行为的改变，解决妇女们或者是大家共同面对的困难。但是，这只是理论，现实往往超出研究人员的想像或计划。华连与妇女鼓队的行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个例子也为行动研究应有的开放精神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行动研究的「银川工作坊」上，华连提出建立妇女腰鼓队，原因是妇女们希望有多些运动和多项文化活动。华连的行动计划跟研究团队的想像有很大的距离。基于储金会的历史，研究团队一直着眼于生态耕种和互助合作如何回应几十年来的常规化学农业，（新）自由市场

经济以及各种政府政策对农村生态、生计以及文化传统的破坏。因此，当华连和妇女们提出水污染的问题时，研究团队提出以保护水源森林和试验生态农耕为主要策略。有关文化，研究团队心目中的是传统的客家音乐和山歌，而且暗暗期望白水跟台湾美浓一样，传统文化的传承跟生态和生计议题得到连结。

但是，储金会的妇女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出现内部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对村里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大都感到无能为力。相反，她们对建立鼓队的事充满热情。鼓队建立后，她们也不畏辛劳，每天在忙完家务和农事后，坚持一起学习和排练。即使存在资金和老师的难题，她们也没有放弃。究其原因，可能是鼓乐相对那些层层相扣牵涉存活的现实，是一种力所能及的梦想。但是，从鼓队的成立和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见到，妇女强大的主观意愿，可以给一个她们看来很简单的行为注入无限动力，并且带来难以想像的可能性，远远超越行为本身。再者，在这些行动里，人以及各种关系，特别是个中的感情部分，是一般「发展」工作没有也不能计算或量度的产出和逻辑。

结果，一个简单的愿望加上妇女的决心和行动，不但让她们增加了自信，同时也为社区创造了改变的条件。对妇女们来说，鼓乐给她们打

开了一道门，既是向外的也是向内的。向内的，就是那种实在的不骗人的身体和精神感觉：快乐、自信、乐观。向外的，就是为社区带来动力，刺激思考，并让妇女自己和其他社群都勇于撇开种种现实的考虑，尝试踏出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一步。在这过程里，作为行动的主体，她们的身体感受跟理性认知通过文化表达得到结合，原来看似跟白水社区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鼓乐，成为社区寻觅出路的一支号角。

4. 另类生活的可能性

4.1〔香港〕王爱华、杨宝熙、陆少琼：从食物展开的城市生活思考

4.1.1 行动计划背景

食物本来是生物最原始最本性最亲密最自然最不可或缺的生活伙伴。人类跟食物的关系纠缠，在提供基本的养分维持生物性的运作中，还细细编织了一整套共生的存活文化，因时因地因社群而千变万化丰富多姿，让我们快快乐乐享受与天地相处的日日夜夜。先辈用生命与自

然共生的努力，编写了几千年被称为文明的概念，里面包括食物的生死观：从生产、制作、食/使用，到回归自然的一整套技术、环境、人文和社会文化生态关系和价值观，是如此紧密地环环相扣，难以割切。现代生活把食物约化为贴上价钱的消费品，食只是让身体有饱的感觉和概念；食物像人一样，在讲求效率和利润的社会发展意识形态中，只能有一个单一和破碎的存活，本来整全的生命是抓不住的泡沫。

一代代在香港这高速膨胀的城市长大的，只知道苹果橘子西瓜是超市架上来的，分不清五谷杂粮四时蔬果，难辨鷄鸭猪牛羊的雌雄咸淡水产的腥鲜……味觉被各种各样防腐剂调味精驯化了，不再能尝出阳光雨露土壤的味道、四时的转化、山水的姿彩……吃的习惯和文化也被城市生活规范化了。香港农渔业，也因为政府长期忽视，我们有田不（让）耕，有鱼不（让）捕，以为只要有钱，食物便可以从世界各地取得无限量供应，而没有思考已经迫在眉睫的全球粮食危机问题对 700 万人口的影响。例如蔬菜的自给率由 70 年代的 70% 跌至 80 年代的 30%，90 年代更急速下滑，2011 年跌至 2.3%。除了量之外，较为有质素保证和拥有很低「食物里数」的本地生产，更是难寻。

正是由于政府对食物、农渔业和环境危机的长期无视，以及近十几年

以大型基建之名更密集地征收农地和清拆农村，加上地产商收购和囤积新界土地伺机发展，引发了不少香港民间团体和个人自发行动起来，对抗主流发展的洪流和保护乡郊和生态环境：有些在新界租用荒弃农地鱼塘种植有机蔬菜（甚至尝试恢复已消失的稻米）；有些组织城市的消费者，通过共同购买支持本土农业和守护新界土地；有些以食物加工支持本土生产；有些搞有机农墟让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看见和交流；有些主办生态和农耕的教育活动，促进城乡互动；有些回收城市二手物/废弃食物循环再用；有些在政策层面推动土地正义和向政府施加压力；等等，其中妇女的角色非常突出，包括搭建消费者和生产者桥梁的共同购买团体「自在生活」（现已结业）的杨宝熙和妇女环保团体「绿色女流/绿慧公社」的陆少琼和王爱华。

4.1.2 「快乐厨房@社区」行动计划的展开

由三位香港「和平妇女」与研究团队的香港成员陈惠芳、陈顺馨和刘丽凝共同推行的「快乐厨房@社区」（简称社区厨房）行动计划，正是希望用公开饭聚的形式，带出食物本身的丰富内涵，以至让更多人反思上述城市人与食物的切割关系，进而改变食的习惯，重新认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食物社区和土地，从而整体上支持农渔业的本土生产。

这种被称为「有名有姓」的饭聚，每个环节都受到重视：餐单的设计，食材的来源，食物烹调的过程，生产者与劳动者的出场，食饭的氛围，饭后的清洁和厨余处理，食饭故事或感受分享等，显示社区厨房要带出的「社区人地情，人间风和味」元素。

2010 年间，团队总共举办了两次社区厨房饭聚，第一次在屯门的自然学校，第二次在因兴建高铁而被迫快将清拆的元朗八乡菜园村。两次彰显的社区元素各有不同。第一次跟屯门这个地域性社区的关系不大，更能带出的是食物背后的社区网路：厨艺和心思都非常了得的爱华是素食餐单的设计者；蔬菜主要来自粉岭一位本地有机农友琴姐；其他一些食材来自广西的小农（通过「自在生活」购买），帮忙准备和烹调食物的妇女来自不同地区，但都是爱华的朋友；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年龄层；以「一人一剧场」形式表演食物故事的朋友是本土的年轻艺术工作者；清洁剂来自生产环保肥皂的「绿慧公社」等等。第二次菜园村本身便提供了重要的社区元素：作为一条一直维持农业生产的村落，村民种植的通菜、香茅、木瓜、沙葛、凤眼果、淮山等，为社区厨房提供了最本地和时令的食材；进行烹调的厨房正是一位村民送娣家里的厨房，而她也参与了食物的制作；参加者通过村民导赏活动亲身体会乡郊社区生活，是理解为何需要支援村民反对清拆的最佳

途径。

4.1.3 社区有厨房，厨房有社区

「快乐厨房@社区」行动所带出的社区概念，其实是有两方面的：一是指具有空间或社群意义的社区，即在生态、生产、人文等方面各具特点的活动地方或群体，以及烹调的食物和快乐地进食跟这个地方或群体的关系；另一是指从种子到餐桌的食物过程涉及的网路与各种关系，即在隐藏在送进嘴巴的每一口食物背后的没有边界或者是跨越界线的流动社区。前者是摸得到、看到见的，无论是屯门自然学校或菜园村，通过一个参与式的快乐厨房活动，参加者会对那个地方或群体增加认识和归属感，彼此也增进了感情，或产生互相支援和传递资讯的社会效果，这些都是增进该小社区以至整体香港的大社区的凝聚力的重要元素。后者则是较难感知到的，特别在香港这样高度城市化和依赖进口食物的地方。由种子到餐桌，食物之所以能成为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的营养，其实涉及每一样原材料的生产、处理/加工、运送、市场（销售与购买）、厨房烹调、进食这些环节。

出外吃饭，一般我们只看到食物端在餐桌和进食这个最后的环节，在

家里吃饭的，也大多只经历到市场或超市购买食材和在厨房烹调的后期加工环节（有些甚至不会参与这方面的劳动），很少看到或想到食物源头、初期加工和运送这些更为影响我们或跟我们的身体（小宇宙）和生态环境（大宇宙）的环节。姑且先放下食品安全的问题不谈，如果我们意识哪怕只是一口的饭菜，其实是跟一个紧密相连、层层相扣的社区网路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更珍惜这口饭菜，对养活我们的、由大自然和很多人共同组成的食物社区和要用心才能保持平衡的社区关系表示感激和尊敬，并意识到身为这个社区的一员的责任和义务。

既然跟世界或大宇宙发生关系，上述食物的每个环节，如果处理不好或受到操控，不仅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还为生态环境、小生产者的生计和文化带来重大的破坏和伤害，而这些破坏和伤害正在香港以至全球蔓延。可以说，爱华、宝熙和少琼在“快乐厨房@社区”活动中坚持支持本地小生产者和小销售者、尽量利用本地生产或较近距离获得的有机食材、不时不食、安排食物生产者和制作者出场、促进传统食物加工手艺的传承（特别是年青人）、带出食物与人地情的亲密关系、尊重付出劳动的人、按需要进食、不浪费食物、厨余回田、呈现食物的记忆和故事、拉进人与人的距离、等等，都是对应这些围

绕食物而产生的隐性暴力的和平行动，让参加者思考，我们愿意吃进肚子上的，是一个由有机的微生物、太阳、雨水、空气、顺应自然、尊重劳动、平等、互相依存、促进本地经济、安全、清洁、满足需要组成的「世界」，还是由化学品、违反自然规律、人工改造、急功近利、剥削性、操控性、污染性、浪费、满足欲望组成的「世界」？

4.2〔台湾〕徐兰香：从护士到养生到集村的尝试

4.2.1 行动计划的背景

徐兰香在「银川工作坊」所订下的行动计划，是建设「养生护士俱乐部」。在主流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俱乐部」是给有闲阶级的人玩乐的地方，但在兰香的心中，「乐」却是一种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获得的身心健康的快乐，而这个「俱乐部」不是安置在高级的空调房子中，而是安住在大地；可以一起汇聚其中的条件，不是靠能付得起昂贵的入会费，而是愿意共同行动，保护大地。兰香说，要实现这个构想，需要经历几个过程：「人的共识、地的寻找、集村制度、养生技术连接、强大的护士反击」。

现在在台湾台东县东河乡都兰村从事生态农业和酿造的徐兰香，90年代初反对政府为修建高速公路截断她当时居住的新竹关西长寿村的饮用水源，开始行动起来，后来成为台湾环保运动的一名硬将，曾经参加的抗争包括反对污染性很高的农药厂、反对资本家以威迫利诱的手法大量收购农民的土地来兴建高尔夫球场等等。她看到台湾急速的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与资本化发展，已经大大破坏她童年记忆中的美好生态环境和乡土生活，例如自50年代始，水稻一直是整个台湾最主要的农作物，占总耕地面积超过六成。但到了70年代中，尽管开发山坡地让总耕地面积上升，水田的面积却在下降，比例跌至56%，原因是很多水田变为非农业用地。与此同时，台湾的化学工业和核电等高污染的生产也在全面发展，排出来的废水严重污染农业资源和生活环境（土地、河川等）。这些环境问题促使台湾环保运动的出现与成熟，过程中，兰香参与的针对化工厂的抗争起了先锋或奠基的作用。根据台湾学者萧新煌就1980~1996期间发生的环保抗争事件所作的研究，兰香参与抗争的90年代初也是环保抗争的高峰，就1991年就发生258宗。农业生产方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也同期出现，除了有化工厂生产的供应外，早期因为政府要增加产量而带动的化学农业已形成农民的「惯行农法」，大部分台湾农民不仅认

为不用化肥农药无法保持高产量，还错误地相信化学农业是现代和进步的象征。

4.2.2「养生护土俱乐部」背后的理念

养生必须先护土，是兰香的核心理念，而护土的第一步就是不要使用农药化肥。她以「放毒给大地母亲」来象征农民下农药化肥，现在「母亲」已在哀嚎，种出来的都是有问题的食物，人类长期吃就生病，接着被送进一般是西医主导的大型医院，继续吃有毒的化学药品（西药）。她有一句名言：「多一个有机农村，少一间大型医院」，很能代表她的想法。此外，她认为养土一定要先养草，因为恢复生物链要从根本着手，而草可以保持土地的水分，并制造一个益虫和害虫可以互相制衡的生态环境，消除对农药的倚赖，恢复土地与人的健康。另外，懂得健康的是伟大的农民老祖先，因为身体健康是靠健康的食物而来的，而不是靠吃药的，所以她无论到哪里，都呼吁村民把老人请出来，向老人学习他们的健康生活之道，还有他们观察土地和传统农耕的方法。除了重整知识系统外，对结构性问题的认识也很重要，即不要玩资本主义的游戏，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各个环节（政府官员、商家，知识分子等），都高度警惕，并提出批判。对于「发展」这个资本主

义的另一个把戏，兰香曾经很形象地指出它是一种「一人笑万人哭的东西」，即一种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受害的行为。

兰香的「养生」概念，来自她对三个「生」的认识：生命、生活和生计，而这些都跟生态密切相关，甚至是前提。

跟一般或主流的「养生」概念很不同，兰香认为土地养育的生命，不仅是人类，还包括野生动物、植物、昆虫、微生物等所有众生；人类的生命也不仅是身体的，还有心理的和灵魂的。可以看到，兰香没有把人抽离整个生态系统，而是视之为其中一个环节。人类健康和安全的生命来自平衡的生态，而这是建基在物种的互相依存关系上的，所以人类不要用自己的观念去决定其他物种的命运，只有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它们，人类才能挽救自己。除了肉体生命需要好的环境来维持外，兰香认为，人类心灵的障碍，如痛苦、憎恨、贪欲、紧张等，也会在一个平衡的生态环境中得到释放，从而获得平静、安详、自在和快乐。今天生活在高度物质化和崇尚金钱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我们，特别需要这样能放松和具有生命力的环境，所以在她想像的「养生护士俱乐部」中，会包含心灵疗养的部分，让来的人敢哭敢笑敢怒敢言敢战胜自己，从而得到心身的平衡与恢复。

生活又有别于经济面向较为突出的生计，涉及不同的文化内涵，如人际关系、社区建设、传统文化的传承等。兰香以「多一个有机农村」来展现健康生活的图景，是因为非常重视生态农耕的集体性，而事实上，以生态循环为基础的传统农耕，是需要集体共同劳动，才能够出现的。生活习惯和态度的改变也是针对生活而进行「养生」的重要面向。为什么现代人愿意花钱去看病住院，而不愿意花钱在吃得健康上？这是兰香经常问的问题。她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把土地吃干净」，是鼓励消费者通过消费有机或天然农产品或农业加工品，除了达到养土的环保作用外，更能支持坚持用有机农耕来养土的农民的生计，达到社会的整体健康，减低医疗等方面的社会开支。兰香认为这些都需要消费者从自然中学习，顺应自然规律（例如吃当地当季的食物），有意识改变生活的习性和态度，揭穿资本主义「价廉物美」的消费谎言，才能真正做到养生。

作为一个有生态和生活关怀的生产者，兰香对于如何维持生计，那就是她从事的工作的经济面向，自有其独特的看法。在她心目中，真正的经济不是钱，而是「经世济民」，而要经营的那个「世」，是包含野生动植物的安全的，而要「济」的那些「民」，是包括子孙后代的安

全的。换句话说，生计不是个人温饱或财富积累的问题，而是包含生态关怀，和人类可持续生活的内涵的。因此，兰香认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算经济，而「算」的含义是将「人情、公义、慈悲、善良、不说谎、人伦」这些钱买不到的元素放进去，共同建构一个对野生动植物和子孙后代公平的社会。兰香这些提法或理念是针对主流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总的来说，兰香认为只要做好生态工作，钱就会跟着来，我们不用花精神和时间在追钱的问题上。有了经济的基础，除了能满足家庭生活上的需要，还可以「有枪有子弹」，跟资本主义和不良的政治「宣战」，保护生态和小生产者的生计，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4.2.3「养生护土俱乐部」行动过程：从外出探访到「集村」的尝试

要在那里建立「养生护土俱乐部」或者是如何建立，兰香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准备。第一个阶段的行动是从访问其他和平妇女和跟她们的交流中获得启发与寻找可能性，包括到优内的家乡云南西双版纳勐宋和王华连的家乡江西万载县湾里路下村，重拾对环境还没有如台湾那样被发展破坏的地方的美好感觉、浓浓的人情味以及逐渐失落的传统智慧；到段锁兰和王树霞的家乡山西汾阳栗家庄村，体会集体行动的

可能行；到香港探访杨宝熙时，看到极端消费主义社会的问题，从而强化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护土养生的信念；到殷玉珍的家乡内蒙古毛乌素沙漠构想一个设在生态沙漠农庄的「养生护土俱乐部」的可能性。

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探访，兰香总结到还是应该在熟悉的环境实践自己的理想，因此展开第二个阶段的行动：尝试集合一批又共同理念的人，长期集体务农和生活，以类似小型村落的形态，实践养生护土的理念。这便是她的行动计划中的「集村」构想。兰香对集体性的追求，主要是对抗资本主义生活形态的个人化和零散化问题的。今天的台湾，以传统小农的耕种方式合作生产的农村已经很少，不仅像兰香老家那样的村落和生活方式不见了，如兰香那样被零散化的农户，虽然能通过商品市场购买或租用土地进行个别的生产，但原有的农村生产关系已经被切割了，田间大多像兰香观察那样，没有了农民集体劳动的笑声，只有机器声或孤独的农人或农工。因此，兰香认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反零散化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恢复在土地上集体劳动和生活应有的功能与乐趣，因为农耕始终不是一个人的事，以农为本的生活原本就是分享性的。这样，当兰香身边出现志同道合的人时，便开始集村行动。

首先被兰香的理想吸引的是三位年轻人，她们达成的共识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源、分工合作、公平分配、俭朴生活、同吃同住、自给自足、土地正义、分享快乐，可以说具有很浓的共产主义理想。首先她们在兰香原有的农地上开始集体耕作，并创意地用二手的物料制作小型手动农具，劳动之后是生活上的分享：共同做饭，吃饭，玩耍等。与此同时，她们构想将来集村的蓝图。硬件方面，村子面积大约 20 公顷，里面有浇灌池、生态池和雨水收集池，建居住的房子三间（每家一间）和供接待运动团体的房子三间，材料用稻杆和泥，自己动手做，并种上一些植物防治土的流失和种香蕉树做围栏。生产方面，主要是农耕和食物加工，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尽量不用大型机器而用人，还可以用香蕉纤维生产布（从纺到织到做衣服）。生活方面，则尽量集体化，以节省能源；要丢掉一些城市生活的东西，以简朴为原则；吃自己种的东西，穿自己做的衣服，也给来的人吃和穿；一起做一起玩，寓工作于娱乐；尽量不跟政府和市场打交道，实践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但跟环保团体打交道，因为是环保运动的一种实践方式，也应为运动做出一个示范。

可以看到，这种近乎乌托邦的集村想像，听起来会让人对其部分构想

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存在一定怀疑，而事实上这些年轻成员后来也因不同的原因，未能坚持下来，集村在 2011 年这个行动研究项目结束时还没有出现，但它是对应着兰香对资本主义和台湾社会的批评和不妥协，并展示了她对实践自己的理念所作的努力。当然，这样理想化的集村计划，对成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容易出现曲高和寡的情况。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基础必须很稳固，才能顺利展开和持续下去。兰香经过多年抗争和实战经验而形成的强硬形象和不妥协的态度，或许未能吸引很多人加入，但这也符合兰香一直的理念——从小做起，甚至变小（相对资本主义的要变大），才能启动和持续下去。一个最后扎根于台东的「养生护士俱乐部」是否会出现，或最终以什么形式出现，我们拭目以待，但到目前为止，兰香的努力和走过的路，是有其参照价值的。

4.2.4 结语：一位地球守护者与母亲的和平愿景

兰香在实践「养生护士俱乐部」理想所作的努力，凸现了她一直没有改变的生态关怀和大爱精神，让我们看见一位地球守护者的身影：

最大的和平就是让野生动物有栖息之地，不是针对人而言，是万物共

存。这个地球是万物共存的，不是人独大的。如果这个世界都是人，
那是一个魔鬼的世界。

在 2010 年 12 月的香港工作坊中，兰香给自己未来的祝愿，则显示作为母亲的她，如何如同守护地球那样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守护着自己的信念：

爱女儿像自己的生命一样，女儿会像你一样会面对环境，面对人生，面对压力，正面迎接，你的女儿也要享受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你已经给了很大的财富给她们，那个财富不是钱，是爱，是公义，以及敢于做自己，至少。你的人生方向已渐确定，不再惶恐。

母亲孕育孩子的心情和过程，应该是所有都应参加兰香的「养生护士俱乐部」的我们，对于大地应有的心情和过程，这样，结合生态、生计和文化的和平工作就能持续下去。

4.3〔四川〕高清蓉：以建立城乡共同体保护地球

4.3.1 行动计划背景

高清蓉（蓉蓉）的家乡是四川省郫县安德镇的安龙村。像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1992 年高中快要毕业时，她便离家进城打工。她的哥哥和弟妹也都离开了家乡，只留下父母在农村。2007 年春节蓉蓉放假回家，看见向有机耕种转型的父母种地很辛苦，决定留下来支援父母，之后更动员了哥哥一程回来。蓉蓉和一程从城市向农村回流并投身农业，在社会主流的生活模式中，可以说是逆流而上的另类选择。

在「和平妇女」行动研究计划的「银川工作坊」上，蓉蓉表示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城乡差距，以共同保护地球为目标的「城乡共同体」。具体来说，她希望自己实践有机农业之余，带动更多农民加入有机耕种的事业。

中国大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制度、粮油供应以至户口制度等，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彻底分割。1985 年，「人民公社」解体和家庭承包制出现后，政府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但只是「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可是，随着外来资本流入和深圳等经济特

区的设立，对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打工。

9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进一步向国际资本开放，加上消费市场的形成，除了进工厂外，农民工也大量投入服务和建筑业。对各地政府而言，鼓励农民出外打工是不需要什么投入的脱贫工程，因此 90 年代出现如「一人打工，全家脱贫」、「劳动力出去，财富进来」等口号。当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开始过剩，部分人希望返乡时，政府则鼓励他们在乡镇投资，转到工商和服务行业中去，用另外一种形式让「财富进来」。

由于青壮年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劳动人口大幅减少，农业生产比过去更依赖化肥农药，加上主流发展方向和政策对农村不利，农民生计不稳，出去了年青人大部份都不愿意回乡务农，留在城市却往往备受歧视和剥削。蓉蓉的家乡四川省是农民出外打工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2012 年农民工人数达 2414.6 万人。

蓉蓉的父母向有机耕种转型，源于成都河流研究会（河研会）改善河流污染问题的计划。2005 年河研会协助安龙村 11 户农民打沼气池、建生态厕所和学习生态农业的方法。他们又组织交流活动，让成都有

心的消费者跟这 11 户农民接触，并安排消费者向他们订购有机蔬菜。可是，蓉蓉决定留下来的 2007 年，已有六户农民放弃，只剩下五户，包括蓉蓉信佛吃素的父母。

蓉蓉决定留在家乡务农后，即学会驾车并贷款买了一部旧面包车，为包括高家的五户农民给消费者配送蔬菜。一年后，订购安龙村有机菜的城市家庭已经有差不多 100 个。蓉蓉还说服了父母把家里的四亩地全部用作有机种植，除了蔬菜外，还种稻米、小麦等粮食。

2007 年成都的消费者开办了有机产品的小市场，安龙村农民可以在小市场销售他们的产品。订购有机菜的消费者又到安龙村探访农户，并参与农务。安龙村农户和消费者间的互动，成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一个重要示范。最早支援在中国大陆推展 CSA 的「社区伙伴」这样介绍 CSA：

从字义上看，CSA 指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做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城乡社区互相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社区经济合作方式。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上，

CSA 一方面看重在保育生态和资源下共同承担、互相分享的社区关系，看重社区中情感及文化的传递；另一方面则往往会推行健康农作法、永续生活及包括身、心、灵在内的整合的健康观念。

4.3.2 配送蔬菜和消费者教育

2008 年当哥哥一程还没有回来时，蓉蓉主力组织连高家在内的五户生态农民向成都消费者供应蔬菜。这个过程非常不简单，从送菜前一天各家总动员收菜、清洗、分配、装袋到蓉蓉收集其他四户的菜袋，开车往成都，然后在不同地区挨户发送菜袋等，整个过程需要大量劳动力、精神和时间。除了每个家庭内部需要分工合作，五个家庭之间也需要互相配合。后来一程代替蓉蓉负责这个工作，也开始联络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逐渐稳定，配菜的份数后来也慢慢增加。

联系消费者方面，也是由高家负责。蓉蓉很重视跟消费者的互动，这不仅为了建立健康的交易关系，还因为她有建设城乡共同体的理念。从蓉蓉讲述她一周的工作/生活情况，可以看到一个要兼顾生产、配送、消费者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家庭的忙乱和辛劳：

我在家怎么过，从礼拜一开始，礼拜一上午就到地里干活，下午就要配菜，礼拜二要送菜，礼拜天比较空一点，整天都在地里，有很多活，觉得忙也忙不过来，礼拜四又成这样了，上午种地，下午配菜，礼拜二我哥去送菜了，我就可以安排地里的活，有时候我哥不在家，外面有什么事，哪里有什么活动就要让我去参加，星期五又干活，星期六和星期天就下不了地了，就要帮我妈烧饭了，要跟那些人讲解了，每天就这样过的，非常忙碌，中途会有人来访，要接待一些人，我跟我妈说以后有人来我不接待了，你们接待，可是有时候妈忙不过来也要去。

4.3.3 生产者的联系和教育

蓉蓉曾说，生产者的联系和教育工作比消费者的难，但扩大和稳固生产队伍是不能不作的。银川工作坊后，蓉蓉想再跟河研会合作搞系统的农户培训，加强交流和讨论，但后来农户间出现了矛盾，她失去了信心，最终没有搞起来。不过，蓉蓉知道，在这几户农民中，她一直是带动者，所以她决定自己先搞好技术，然后才组织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2009 年，三户农民自愿参与进来，并由一程带动做。由此可见，高家和其他几户农民的实践和建设，无论从理念（保护生态、吃的健康、良心种植、对消费者负责等）到实际运作（种植方式、运输、消费者网路、透明度、宣传等），的确起了示范作用，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基础。

4.3.4 掌握生态种植技术

蓉蓉在「银川工作坊」提出她的行动方案时，强调要从土地做起，而她最想改善的是土地的养份。她从书本中学到自己做土著微生物来杀菌、促进堆肥的发酵和释放土壤的肥分。另外，她了解到植物轮作可以减少虫害和避免土壤养分失去平衡，以及按照属性配搭种植蔬菜的种类等。

蓉蓉认为，有些从书本学来的技术，部分的确可以更新一些老方法，例如以前做堆肥不会加微生物，现在用了确实能加快发酵；书本也能更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一些从经验总结出来的知识，如驱虫植物的种植和配搭等。但是，她认为不少技术和经验，还得向上一辈农民请教和靠自己摸索。一方面，不少农耕经验丰富的老人，虽然非常懂得做，

但说不出所以然来，因为语言并非他们最习惯使用的表达工具；另一方面，农耕本身就是要靠对变化中的环境和气候做出观察和判断，灵活处理，不能死板地按照一套讲法去做。向老农学习，就是要学习这种懂得观察、摸索和判断的知识和智慧。

4.3.5 建立生态农耕示范园

除了着力吸收生态农耕的知识和技术外，蓉蓉的行动计划还包括扩大耕种面积，建立一个生态农耕示范园。蓉蓉希望可以借此吸引村里其他农民转型。她认为，大多数农民对环境和健康问题认识不足，对市场或消费者也缺乏信心。她希望通过一个生态农耕示范园，「总结经验，让新加入进来的人，不要走太多的弯路。」

2008 年蓉蓉家总共有五亩多的地，种植蔬菜为主，其中租来的九分地用来种小麦和稻米，主要作为家庭的口粮，剩余少量的供应给消费者。她希望第二年将耕种面积增加至 15 亩，这样比较容易在种植上作规划。除了蔬菜外，她希望能够多种粮食、草药、香草、水果。她认为多样化的农场可以形成一个循环，把生物链恢复起来。2009 年，她租下了家附近的七亩地，但却面对很多困难，包括跟家人有不同意

见和资源上的限制等。

2010 年 12 月在「香港工作坊」上，蓉蓉说她不再坚持用一个生态农耕示范园的形式来实践自己的理念，而是外向地组织更多农户一起做。她打算将部分土地分租给城市消费者，作为生态教育的一种方式，部分土地她用来尝试不同的种植。但是，2012 年蓉蓉在徐堰河边租了地，建立了她自己的农场，叫「百草园」。她为十多个城市家庭供应蔬菜和粮食外，还带 CSA 实习生和组织农村体验的亲子活动。另外，她又种了各种香草，自制了香精提取蒸发器。

4.3.6 总结：逆流而上的选择

虽然经历种种障碍和困难，蓉蓉终于建立了一个生态农耕示范园，在相关理念、认识、知识和技术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明显的是她通过自己摸索而获得的生态农耕知识和技术。她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不仅是为了改善生产的品质，还在于通过分享、讨论和互动等知识传播的方式，带动更多农村的生产者和城市的消费者加入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至于一程，则仍然跟父母和其他几户农民一起向消费者配送他们种植的有机蔬菜。

蓉蓉与一程这样的打工青年回乡实践生态农耕，不仅能维持生计，更能对生活有新的思考，对生命有新的追求。虽然像他们一样的年青农民现在只属少数，但他们的实践毫无疑问为农村青年立下了另类榜样，而 CSA 的概念与实践则为他们的另类选择，提供了理论上以至实践上的支援。反过来，由于高家和安龙村生态农民的坚持，CSA 成为当地的一种社区经济模式，而城市消费也认识到他们的健康和存活问题跟「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同时，安龙村生态农民的实践，展现了农民的主体性、创意、智慧和主动性，改变了主流社会对农民和农村代表「保守」、「落后」的刻板印象，让更多人看到农村厚实、活泼和多元化的生活和文化；相比之下，城市的生活可能更单一、枯燥和不可持续。

5. 总结：可持续平和的条件和愿景

基于「和平妇女」的经验和这项行动研究的启发，我们总结可持续平和的条件和愿景四点如下：

5.1 从日常生活做起

战争（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内战）与日常生活暴力的性质是相同的，源头也是相通的，那就是日益短缺的地球能源和土地资源的争夺、霸权主义的格局与意识形态（包括国际与国内政治、跨国资本与全球化经济、男权等）、竞赛或竞争（包括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心理、文化偏见与冲突（包括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地域等）。战争其实是日常生活常态和秩序的捣乱和破坏，让人民的生活空间变成战场，生命进入危难的状态，同样，非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的危机，其实已是战争的前奏。因此，和平行动远远超乎停止战争引发的直接暴力的和解努力或战后的补救举动，而是从日常生活入手，防止制度和文化等间接暴力的出现。和平研究学者约翰·加尔通将前者称为「被动的和平」(negative peace)，后者称为「主动的和平」(positive peace)。主动和直接介入日常生活的危机，如保护生态环境、珍惜与共享资源、促进民主与平等、实践互助合作精神、搭建关系、放下偏见与执着、促进了解等，会间接减低战争爆发的机会。

5.2 重视妇女的智慧与行动力量

生态女性主义曾经指出，人类对地球的压榨，跟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是

出于同样的霸权逻辑的，因此，了解在主流性别秩序中处于劣势的妇女的处境，重视其生活与行动的智慧和价值，不仅可以促进性别平等，还能恢复生态平衡。从参与这次行动研究的每一位「和平妇女」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妇女拥有的生活智慧与行动力量：玉珍在恶劣环境中展示的强大生命力；海澜种植葡萄治沙的勇气；蓉蓉回归家人和土地后迸发出来的毅力与创造精神；锁兰与树霞的思考、尝试、社区动员与组织能力；华连的利他精神与妇女鼓队的创造力；优内与法内突破文化与地域上的障碍，为村民寻找可持续生计的努力；爱华通过食物向身边的人传递乡土风味和传统智慧；少琼超越家庭角色的限制，建立合作的关系和热心参与社区事务；宝熙搭建生产者与消费者网络、促进城乡互动的努力；兰香强大的实践与思考能力以及捍卫地球的决心与勇气；静慧回乡与维护生态环境、农村社区与客家传统的智慧；来红、秀枝与「主妇联盟」成员凸现的主妇力量与环境友好生活的动力；等等。她们的智慧与行动力量除了有性格的因素外，主要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与投入，还有由多样情感所激发的能量，包括对家人的爱、对土地的联系、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妇女之间的认同感与姐妹情谊、对下一代的关注、对平等、正义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对自我实现的渴望等。这些在强调客观理性的男权社会中一般被忽略或压抑的妇女智慧与力量，是维持和平行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5.3 打破身份、地域界限

暴力很多时是由人为的隔阂造成的，例如身份、地域界线等。

5.3.1 研究者与行动者的界限

在这次行动研究中，我们试图打破的第一重界限主要是围绕研究者与行动者的身份的，即视研究团队的工作为和平行动的组成部分，而行动中的「和平妇女」也是研究者。换句话说，研究与行动不应分开，因此需要打破被主流学术固定的研究者与行动者身份想像，即研究者应该是专业的、抽离的，行动者则是非专业的、投入的，后者是前者的研究对象。研究团队成员对于自己是在执行和平行动有一定的认知，例如意识到与「和平妇女」之间需要建立「去权力」化的关系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否能做到与「和平妇女」共同推动行动计划，并协助她们共同记录、讨论和反思（即研究）自己的计划，成员中间存在一些困惑或疑惑。无论如何，虽然实践上存在某种局限性，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身份界线，仍然是我们的和平愿景之一。

5.3.2 地域上的界线

第二重我们希望打破的是两岸三地「和平妇女」在地域上的界线，以及包含在内的城乡界线。虽然这些界线的形成，存在我们无法逾越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我们看到，在整个行动研究的过程，「和平妇女」之间不仅没有出现矛盾，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与合作关系。在交流的过程中，大家不是没有意见上的分歧，但只限于工作方法，相反，对于一些地域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大家还能做到互相包容。在「和平妇女」互访交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些不自觉的不对等关系的出现，源头也是上述的城乡、地域分隔问题。我们最初构想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举行三个工作坊，正是希望提供机会让两岸三地的妇女在各自的生活情景中互相看见，借此消解大家对对方错误的想像，增进真实的认识。虽然在台湾开工作坊没法实现，锁兰与树霞在看到香港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后，能打破原来对香港繁华都会比中国农村优越的印象，已很好的说明了打破地域隔阂的重要性。当然，根深柢固的地域界线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认知，但这次「和平妇女」的行动过程告诉我们，性别间的认同、情感的建立以及对生态、生计和社区文化的共同关怀，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界线造成的障碍，而存在于两岸三地的差异性，更带来不同的知识碰撞机会。

5.4 和平的逻辑及价值的传播

「和平妇女」在行动中体现的另类逻辑与价值重建，如果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且成为人类的普遍价值，便能为可持续和平提供关键的文化资源。以下这些我们在「香港工作坊」总结出来的和平逻辑与价值，希望能为抗衡战争的逻辑和资本主义、发展主义等主流价值，提供参照：

供参照：

——对生命/传统/不同文化的尊重；

——对土地的情感；

——对身边的人宽容、接纳、真诚、互助、开放、付出；

——对自身信念的坚持；对个人能力抱有自信和获得发挥的机会；

——快乐生活是自给自足，互相依存、分工合作、动手创造、心身合一、文化多元；

一、文化多元；

——社区精神来自本土、参与、民主、共融、文化传承、各种关系的

搭建；

——集体价值与集体生活再被确认；

——农的价值与作为生活方式再被确认；

——小型社区经济代替大型扩张性全球经济；

——从小事做起，回应大环境；

——每个人都是知识的主体。

研究团队制作《妇女、和平与可持续生活》纪录片系列，以及出版《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和这个研究报告的网上版，是众多传播这些价值的途径之一，我们希望中国「和平妇女」扎根于生态、生计与文化的和平行动，能为人类面对的各种危机，带来行动的动力、启发与希望。

行动，就是和平的开始，也是和平得以持续的基石。

完